

书香云南

通古达今 有迹可循

——读《寻觅滇人的足迹——滇池东岸古村落调查》

陈朝华

“这是近年来研究古滇人流变的创造性成果,将古滇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著名历史学、民族学教授林超民先生对近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寻觅滇人的足迹——滇池东岸古村落调查》一书作如是评价。

20世纪50年代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出土,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神秘古滇国的存在。而后,学界和相关人士对创造了辉煌古滇青铜文化的古滇国和古滇人的探寻一直没有停止。20世纪90年代云南青铜器在欧洲6国展出时,时任德国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郭乐知对大理崇圣寺三塔文物发掘者即本书作者邱宣充提出了“古滇人的后裔是否还存在,他们去了哪里”等问题。当时无法作答,跨越30多年的问题,却一直萦绕在老先生的脑海里。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早期考古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邱宣充经过数十载沉淀和近3年对滇池东岸50多个古村落的调查,以及对古滇文化时期、爨文化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元明清时期的滇池东岸和昆明东郊古驿道调查研究,终于在他的收官之作《寻觅滇人的足迹——滇池东岸古村落调查》(以下简称《寻觅滇人的足迹》)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古滇社会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古滇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文化因素,依然顽强地传承给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成为当今滇池东岸许多古村落中的文化基因。宝象河流域分布的彝族撒梅人和马料河流域分布的撒马都人均是古滇人后裔。至汉以后,他们的祖先与汉族高度融合,成为滇池东岸的土著民族。而当时作为统治民族的越人,显然已迁移,迁移的方向在今晋宁、安宁八街、新平漠沙等地均有线索,有待后人的探索。

结论的得出,基于滇池东岸彝族支系撒梅人和撒马都人的传统文化与古滇文化的关联,主要反映在虎崇拜、祭龙礼仪和祭天礼仪三个方面,以及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一、以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为代表,古滇人把虎作为攫取财富和守护财富的神物,而现今撒梅人和撒马都人依然把守护村寨的石虎称为财神,把住房屋顶上的瓦猫作为家庭的保护神,把虎头帽和虎头鞋作为儿童的保护神。其间明显存在历史的渊源关系。二、官渡羊甫头古墓群出土的漆木雕木祖,一方面证实了漆木器的制作技艺来自中原的楚文化,同时旁证了庄蹻王滇的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出土的漆木雕木祖是祭龙礼仪中的一种祭品,祭龙之前先要祭猎神,这些带动物装饰的木祖就是祭猎神的祭品,这在同属西璧白蛮的弥勒市彝族阿哲人的祭龙礼仪中得到了印证。三、将晋宁石寨山1956年第20号墓出土的祭祀贮贝器与今官渡阿拉彝族小高坡村撒梅人的祭天礼仪相对照,说明古滇人的祭天礼仪与农业崇拜有关,而小高坡村撒梅人的祭天礼仪与古滇人的祭祀礼仪一脉相承。遗存主要

反映在阿拉乡各村都有一座祭天山,以及祭天返村后的天灯柱等遗址。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主要表现为:“跛池”的存在;至今流行在滇池东岸古村落的草墩的外形与铜鼓的形状相似;民间流传“阿乌”及小吃“脆麻角”的形状与古滇墓葬出土的铜瓦铤形状相似等。

《寻觅滇人的足迹》全书分调查篇和研究篇两大部分,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色及价值。

一、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用动态的社会学调查阐释静态的考古学资料。西南是多族群、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考古文化多由这些民族的先祖创造……因此,西南考古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族考古。通过民族考古学等“中程理论”来帮助解读考古遗存,可以说西南地区在中国考古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书中的调查与有史以来关于古滇文化的各种典籍记述互为印证,在实地调查研究中推陈出新。书中对滇池东岸每一个古村落的调查都认真踏实、细致简明、客观准确,语言平实、叙事精练、笔调清新,堪称文物调查的范本,从中可见作者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

二、对考古学研究颇有启发。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作者认为,在云南“让文物活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文物的研究要与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读懂考古学这一部地书。将考古发现和考古遗存中古滇文化因素与彝族撒梅人和撒马都人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照比较研究,正是作者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这对当代考古学研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作为云南考古奠基人之一,作者对孙太初、张增祺、蒋志龙、闵锐、杨帆等云南考古学发展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几代专家学者给予极大肯定,并表达了对后继者们取得更大成就的深切期望。

三、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重大。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它以中原地区的文化为主体,与周边许多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我国西南地区分别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和石寨山青铜文化就是多元文化中的佼佼者。历史上云南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有力证据

在书中可谓处处可见。汤池涌金山万福寺土主宝殿中供奉有白族英雄段宗榜(南诏西征驃国、师子国的名将)的塑像;普照村小庙供的关公像上塑有虎头;在彝族撒梅人中传播的道教又称“西波教”,传播的道教舞文经典称“西波经”;撒梅人崇拜虎亦崇拜龙,典型的彝汉文化交融象征……

在研究篇中,作者以“古滇文化时期”“爨文化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和“元明清时期”滇池东岸滇人历史演进、社会变迁历程展现了诸族相互依存、互相包容、交流融合,共同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对认识从古滇人到今云南人的交流、融合、凝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极大的社会意义。

怎样让文化赋能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云南作为旅游文化大省面临的现实问题。《寻觅滇人的足迹》中对50多个古村落的调查研究,对于实现滇池周边旅游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和保护中发展,从而使昆明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晋宁区作为贝丘文化遗址最多的地方,对贝丘文化遗址的重视、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呈贡区乌龙铺村、海晏村,官渡区大板桥镇、高坡村、高桥村,基于其历史文化价值,应该推荐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或名镇;在保护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基础上,打造遗址公园,与国立交专公园呼应,形成“两核一轴”城市文化名片的同时,对滇池周边村落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全方位、多形式的介绍、宣传。如白土村小老舍土主庙、三瓦村祭山公园体现彝汉共融的民族文化和相关民俗活动的介绍推广;汤池老酱、七甸卤腐为什么有名,汤池除温泉、烤鸭、老酱外,作为古驿道重要站点的诸多历史文化遗迹更要推广宣传;滇京、滇桂、滇越几条古道的沿线文化旅游线路沿途……

只有把促成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民族文化基因深植于经济发展中才能凸显特色,实现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例如当前的网红打卡地海晏村,普通人只知道它的落日余晖海景之美,却不知道它与呈贡区乌龙铺村一起,是目前昆明滇池东岸保存土木结构传统民居最多的两处古村落。海晏村保存一颗印传统民居众多,并完整保持了村落的主

体格局和街巷,该村尚有多处土木结构一颗印传统民居以及寨门、寺庙等遗存。瓦角村却是传统的土木结构民居转化为砖木结构传统民居最为典型、最为完整且适宜人居的地方……

作者以一名老考古专家的视角,对3000多年来滇池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宗教、建筑等进行了梳理。基于“古代交通沿线的城镇馆站是在古代交通沿线传统村寨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实,图书最后对“滇京古道”“邕州古道”“安南古道”的碑记(如滇阳驿堡夫置田碑、板桥驿别除苛派碑、叙复滇阳堡夫碑等)、路面等进行文字整理和文献对照,使我们对云南历史上通京(北京)、通桂(广西)和通越(越南)的交通路线有了古今对比,对沿线村镇的历史文物、风土民俗有了更深远具象的认识。这些内容对有心人而言,可谓随时埋线索,处处见宝藏。

云南晋宁河泊所考古发掘是近些年古滇文化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邱宣充指出,在云南晋宁区发现贝丘遗址数量最多得益于2008—2010年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员与美国密歇根大学联合进行的考古调查。而今年5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年度原创大展“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则汇集了中国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省市32家文博单位馆藏的294件(套)铜器、金器、玉器、海贝等精品文物,共同讲述了中国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演变格局。

从上述可见,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和云南古滇青铜文化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在考古界的跨界、跨区域交流合作,可以更好地实现协同发展的目标。具体到宣传和文旅发展等领域,除学界的协同研究外,是否可以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于地方民族文化文化的发掘、整理,通过系列主题的策划和相关产品链的开发,充分利用AI等高科技,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实现跨区域、跨界、跨领域的合作交流和协同发展。

《寻觅滇人的足迹》封面采用的是上过“国家宝藏”节目的滇青铜文化代表作——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的图案。这件国宝级文物为束腰圆筒形贮贝器,腰部两侧各饰一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逼真生动。器盖上下四牛环绕,健壮有力,骑士身着佩剑,全身鎏金,耀耀醒目。设计师对图片进行了再设计和加工处理,使之更好地凸显古滇文化中虎崇拜和牛作为财富象征与图书主题相呼应的效果。说到底则是作者在海晏村发现的一处原生贝丘遗址图片,寓意深远。从而实现了图书内容和形式一体的主题凸显,有史以来,文字的记录、传承和考古相辅相成。当下,文化宣传和考古界、学界的互动交流和研究成果应该渗透到更广泛的百姓生活中,通过各行业协同作业,实现云南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助推新时代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文艺新闻

找条河流为旅伴

尹宗义

作为一位老师,读到杨铠聿《奋斗的姿态》,我倍感亲切。这部作品,相当于杨铠聿的成长史,其中的点点滴滴,折射出童年生活的绚丽色彩:有成长奋的姿态、镌刻着最美的誓言;有学习生活的欢声笑语,激荡着幸福的回响;有哲理的火花闪烁,探索深邃世界的美好。儿时伙伴的身影,深深印在脑海;同窗的趣事,还回荡着成长的笑声;家人的爱,是一道永不褪色的颜色。

小作家能从社会道义和良知出发,关注生活,热爱生活,将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诉诸公众,产生阅读的共鸣,正是基于这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愿望理想,灌注于日常的习作之中。杨铠聿写这些作品时,虽然还只是个孩子,是个学生,作品也还稚嫩,但其社会责任感,或者说是责任、良知的种子,已在文学的沃土里发芽。

《橙黄色的天使》写对保洁人员的爱,体现博爱与平等思想。他捍卫弱势群体尊严,为他们发声,为他们代言。正如杨志军写农民工,“带着满眼的慈悲看着这个庞大群体在时代的洪流里奔突浮沉,有感于他们带着巨大牺牲的沉默与悲哀,转而起笔记录他们真切淋漓的痛与笑、难与言的孤独与无助、深黑沉重的耻辱与垢,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值得敬重的理想追求与信仰坚持”。《橙黄色的天使》虽然只是一篇千字散文,但以叙事的粗线条勾勒,搭建起作品轮廓框架,文章内在的血肉也有动情之处的细腻与柔情。

《下一次,我将闪亮登场》通过对人生高度与思想深度的描摹,凸显出对人生、岁月、生活的思考;《说句心里话》写一件令人后悔的事,最后总结出一个道理:“千万不要为了面子而做出错误选择,好面子真的没意思。”《有趣的活动》写自己在游园活动中做服务工作也很快乐,点明“工作是很快乐的”的深刻道理;《生“风”如“仙”》写对凤仙花牵肠挂肚,担心它生出虫,懂得大人为什么会整天担心、牵挂自己的孩子的道理。

杨铠聿说:“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这些都会融进你内在的气质里。当你读过好书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是如此优秀!”读书,可以让你拥有一个有深度的灵魂;读书,是一个人快速成长的捷径。顺着杨铠聿写作的脉络,我们还可以读到许多内容,如《计算器的变化》告诉我们发展变化的规律;《记一次长跑》记述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处理问题;《可爱的文具盒》写发表作品得到奖励,激励自己要好学习,对得起这个漂亮、时尚的文具盒;《接电话大法》通过写奶奶学开单元门,赞美奶奶的乐观;《时尚达狗乖乖》点明“做一只狗,也不能虚伪”的道理。

杨铠聿的文章在运用写作手法方面,已有一种写作者的本能。《秋天的树叶》运用拟人手法,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银杏叶染红、飘落,最后成为一个小朋友的书笺,可以天天读书,把美好的一切都留住;作者五年级写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回忆了二年级的学习经历,自然运用了倒叙与插叙的手法;《说句心里话》在结构上,制造悬念,引起阅读的兴趣;《指名道姓》先铺垫哪



些名字取得缺少新意、俗不可耐,不够诗意,再点明自己取的名字很特别,给读者很大的期待,但出乎意料的是,取名的四个字,竟然写错了两个字,被老师批评,同学笑话。他巧妙运用铺垫、蓄势的手法,把一件普通的事叙述得一波三折,看得出杨铠聿很有讲述故事的天赋。

品读杨铠聿的《奋斗的姿态》,可以让小读者们深深地懂得,要写好文章,必须懂得运用写作方法,无论是表达方式的自如

切换,还是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无论是结构手法的整体建构,还是小词造句,都要讲方法技巧。杨铠聿在《奋斗的姿态》一书中,为小作者都作了很好的示范。

杨铠聿在写他的同学、家人、朋友时,虽然欠缺了一些浓墨重彩,但简单勾勒,寥寥几笔,便让作品中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牛奶男”写同学的调皮、可爱,特别是写张将同学们的牛奶袋塞进衣服里,冒汗肌肉,显示自己是“肌肉男”,描写得富有童趣。《调皮同桌“神叨叨”》里的同学形象像唐僧念紧箍咒一样“呜里哇啦”,令人难忘;《我的朋友是画家》写朋友着迷绘画,总是画得入迷,梦想笃定,立志设计出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一个个形象,简单却明晰。

杨铠聿的写作语言自然流畅,也不乏生动,如《接电话大法》中把进不了单元门的“我”形象比喻成小“流浪汉”。而《冬来的味道》对枣子的描写,更是具有特点,富有情趣:“老师让我们把所有枣子都聚在一起,摆在一张纸上。这张纸突然变成了一个‘舞台’,上面的一些‘选手’,有的像唱流行歌曲的歌手,因为它一半红一半绿,不正是一套流行服装吗?有的像一个穿着桃红色裙子的孩子在跳舞,谁让它弹性那么好?还有的在耍杂技,不停地在‘舞台’上滚。在这堆枣子中,我一眼就看出我的那颗枣子,绿绿、圆圆的,再细细看还有点小皱纹。它动也不动地趴在那里,仿佛是年纪大了,经不住车马劳顿,睡着了!”

杨铠聿在小学的习作中就有意识锤炼语言,使之形象生动。若持之以恒,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强。他从日常生活中撷取琐事来写作,文章设计和语言表达就显得起其重要。《张口闭口都是字》展示中国汉字的独特魅力,“用一个口、两个口、三个口……十个口来分别猜十个字。”《指名道姓》写老师让学生给自己取名字:“名嘴C罗”“雨打芭蕉”“呱呱呱”,并且进一步开展互动环节,老师点到新取的名字,对应的学生来答“到”,体现新名字与自己的契合度。这些文章的内容,趣味横生,选择得当,体现小作者特别注重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悟。

巴金说:“只有写,才能写好文章。”热爱文学的杨铠聿,从小学一路写下来,写了不少文章。如此坚持,相信他后面的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好。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xjglmzg@163.com

新书推荐

揭开生物演变与进化的秘密

——《纠缠的树》读后

彭忠富

在大约40亿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生命才从最初的样子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琳琅满目、错综复杂形态?怎样的偶发事件和必然事件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造就了人类这样神奇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对进化的认知都来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就像一棵树,位于进化树不同位置的生命由于个体差异产生不同子代,并在自然筛选下形成不同的物种,也就是说,进化来自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

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国卡尔·乌斯为代表的科学家开始以RNA(核糖核酸)序列重新审视生命史,他们发现,进化之路比我们原先所认为的要棘手复杂得多,生命之树的枝干也比我们所预想的更为纠缠。乌斯认为,关于生命之树,过去40年里一共有三大巨枝:细菌、真核生物、古菌。它们从我们已知的所有生命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分化出去。这里的所有生命,指的是地球上的生命,共用遗传密码的生命,开始于RNA世界,然后产生细胞,跨越达尔文门槛,变成非常复杂的生命。

美国作家大卫·奎曼认为,人类从不是进化的终点,人类的基因不只来自祖先,还来自树、蚊子、细菌,甚至病毒,是多种生物间的基因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奎曼出版的《纠缠的树》(吴晓真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7月版)包括“一种独立的生命形式”等7部分,用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串联起人类基因发展史。作者指出,每一次生物学的伟大发现背后,都暗藏着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学术圈日常。作者抽丝剥茧地为读者阐释进化、生

命与基因,同时揭开了达尔文、卡尔·乌斯、林恩·马古利斯、理查德·道金斯等生物学家大佬时而腹黑时而可爱的真实面貌。这本书将颠覆传统线性生命史观,重塑生物演变与进化概念,带你重新理解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作者指出,通过分子系统发生学,在我们人类是谁,我们是什么、地球上的生命如何进化这三个问题上,以卡尔·乌斯、林恩·马古利斯等为代表的科学界有3个令人惊讶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涉及一种异常的生命形式,一种全新的生物类别,它们以前寂寂无闻,现在被称为古菌。第二个发现是一种从前不甚起眼的遗传模式,现在叫水平基因转移。第三个发现揭示了我们的起源,或者说提供了一种极有可能的理论:人类也许来自一些若干年前还不为人知的生物。上述的三个发现既实际又深刻,因为我们已知的生命面临挑战,需要调整对人类是谁、什么造就了我们、生物世界如何运作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理解。

关于乌斯发现和命名的古菌,其最新认知是,所有的动物、植物、真菌,以及所有细胞核内有DNA的复杂生物,都是这些古菌的后代,就连我们人类也是其后代之一。乌斯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学这一领域和我们生命的起源,然而,在分子生物学曲高和寡的走廊之外,大多数人仍对乌斯一无所知。作者指出,卡尔·乌斯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极其敬业,非常内向。他认真研究某些深奥的问题,始终执着地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计划,对除此之外的大多数问题熟视无睹。也就是说,在攀登人类基因科学的道路上,乌斯的成功之道在于心无旁骛。

新书推荐

以盛世的情怀诠释盛唐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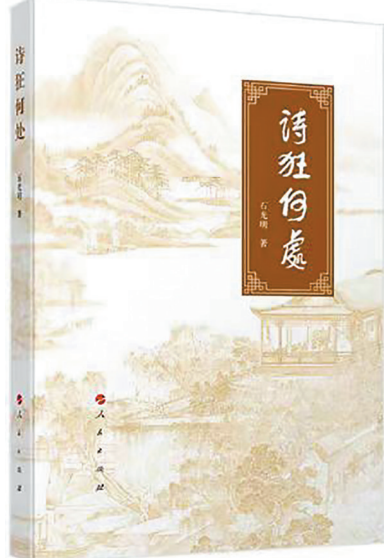
——读石光明散文集《诗狂何处》

刘绪义

在秋天的午夜,我泡上一壶黑茶,捧读起石光明先生的《诗狂何处》(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版)。在这部散文集里,他愈来愈精到的文笔,他的盛世情怀、他的文化精神,燃起了他那绵远的盛唐乡愁。

一生“高开低走”的王勃,“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王维,“孤胆独援”的陈子昂,盛唐大手笔、江湖唱无奈的张说,活在唐明皇悔恨思念里的张九龄,喜欢出关玩月的王昌龄,史书中抑多扬少的崔颢,秋风驼铃里的边塞诗人,遗憾也能铸成诗碑的孟浩然,风月才子李白,“诗狂不何处”的贺知章,如此等等,盛唐诗坛中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排队走过我的眼前,伴随着石光明的文字,也唤醒我沉睡多年的盛唐乡愁,许多熟悉的、陌生的风光,如穿越时光隧道一样,激起我无边的遐思。

《诗狂何处》是一部浸透着作者深厚学养和史识的学术散文。这种学术散文不同于曾经流行的历史文化散文,将个人情感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凭着宏大叙事与浓烈的想象来渲染人情怀,文字看似壮美实则虚空无着,读完之后并无实质性的美的享受。当然,它也不同干那种颇受人喜欢的学者散文,适应当代传媒快餐式传播的需要,以短小的篇幅,讲述学界或学者的心路历程,回顾学术经历,纪念一段学术情缘,记载某种学术思考,展示某种人生思考,让学



术走进大众视野。

石光明不在学界,也不受历史文化散文的框囿,他走出了一条新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篇学术讲座。《与君离别意》虽然是讲王勃,却展现了初唐四杰的另一面;《月明夜郎西》虽是讲王昌龄,却澄清了一段千年的误会;《总是风月无边》虽是讲李白,却展现了洞庭湖的无边风月。他的文字出入盛唐政治、文化、社会、文学、山水地理等方面面,从庙堂之高到底层土

子,从羌笛悠扬的边关到落叶满阶的江南,视野恢宏,触觉灵敏,从一代诗风的产生到转变,从诗歌的意蕴到诗理的内涵,从诗人的行状轨迹到诗思的兴寄感叹,贯穿成一篇起承转合的学术脉理,有考索,有梳理,有钩沉,有评析,时常给人以新的观点和新的启发。

以书名《诗狂何处》为例,人们想到“诗狂”,一般的指向都是大诗人李白,作者却写的是贺知章。对于贺知章这个“诗狂”的雅号,很多文学爱好者未必知道。作者正是带着“诗狂何处”这个疑问,帮我们从史料中探究出一个“诗狂”形象。36岁的贺知章一举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史记载的状元,足以狂喜却淡定依然,一狂也;60岁以前,不争朝夕听天安命,少有微澜,二狂也;60岁以后,高位晚来,却依然放旷善语,散淡风流,无复规检,三狂也;不以诗干谒,不旗亭画壁,不叩诗囊,随写随扔,四狂也;不怒不恼,没有政敌,亦无私敌,五狂也;金龟换酒,酒后骑马,醉态朦胧,滑稽劝谏,六狂也。有此六狂,完整地诠释了唐人眼中的“狂”,与我们所理解的“狂”,全然是一回事。李白仰慕其“风流”,杜甫将其排“酒中八仙”之首,李林甫称其为“邈邈南斗边”的“汉疏贤”,唐玄宗亲自赋诗送其归乡,摆酒长安,百官送行。他自己呢?生怕别人不知已狂,还自号“四明狂客”。这恐怕是“狂”的最

高境界。

作为一部散文集,其语言像很多采用学术散文笔法的纪录片解说词,优美而不失质朴,练熟而又沉郁,没有汪洋恣肆的情感抒写,却能传达出盛唐诗人真实情感、对诗歌艺术的深刻理解。没有故作解人的文人姿态,却能在丰富史料中勾画出盛唐诗人的独特性格和情感世界,启人深思,给人启迪。

盛唐之盛,盛在一股气,这股气,令人不由自主想到李白之狂、杜甫之愁、王维之禅、王勃之慨等等。石光明正是以这种古老的盛世情怀去悟千年前那个盛世的诗人情怀,因而作者与古人之间便自然产生了一种共通共情,这个基础上,作者更能真切地理解古人,对其诗思与行状更有了有一种时隔千年却恍然同在一个时空的同情的交流,共同构筑起一种跨越千年的“乡愁”。这“乡愁”与其说是盛唐的,不如说是当下的。的读者细品,就不由自主地滋生起一种与古人共通的强烈的文化自信。

美文之美,美在一股气,这股气,在文章就是魂,在作者就是骨。石光明长期浸润在唐诗宋词的神韵当中,显然已经将唐人风骨、唐诗魂魄内化于心,外化于笔,化为这一篇篇散文,月旦唐诗,品悟古韵,以其盛世的情怀书写了一种盛唐的乡愁,为我们精神生活增添了一份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也滋养了我们当下盛世中国的一种文化自信。